

〈論說〉

明代《径山藏》刊刻始末考

秦 弋 然

摘要：明代《径山藏》的刊刻因其活动历时之久、参与人数之多、过程之辗转复杂，成为明代佛教史上十分重要的历史事件。其刊刻的原因主要与明代佛教发展的世俗化倾向有关，重振宗门的愿望使方册本大藏经的刊刻成为势在必行，同时也与《永乐南藏》、《永乐北藏》中存在的讹误密不可分。在袁黄、紫柏真可、密藏道开等人的极力主张下，经过长时间的筹划，《径山藏》于万历十七年（1589）在山西五台山妙德庵开始刻印，其后又历经浙江径山兴圣万寿禅寺、径山寂照庵、径山化城寺和嘉兴楞严寺等多个阶段，最终不得不随着明王朝的覆灭而宣告中止。明代《径山藏》的刊刻在佛教文献、社会史料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彰显出文化交流和人文精神的深层价值。

关键词：明代；《径山藏》；径山寺

The Manufacture of Jing-shan Edition of the Buddhist Tripitaka (Jing-shan Zang) in Ming Dynasty

Qin Yi-ran

Abstract: The manufacture of Jing-shan Edition of the Buddhist Tripitaka (Jing-shan Zang) was the most important event in the Buddhist History of Ming Dynasty, for its long period of time, larg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and complicated

process. The reason for the manufacture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ecularization tendency of Buddhism in Ming Dynasty, the Buddhists were eager to promote the rejuvenation of Buddhism. And it also have directly relationship with the correction of the mistakes in other versions of the Buddhist Tripitaka. Under the urge of Yuan-huang, Zi-bo-zhen-ke and Mi-zang-dao-kai, Jing-shan Edition of the Buddhist Tripitaka (Jing-shan Zang) begun to manufacture in 1589, at Miao-de-an, Wu-tai Mountain, after a long time of planning. It was then been moved to Xing-sheng-wan-shou Zen Temple, Ji-zhao-an, Hua-cheng Temple in Jing-shan and the Leng-yan Temple in Jia-xing, but unfortunately, it was finally been suspended by the disruption of Ming Dynasty. The manufacture of Jing-shan Edition of the Buddhist Tripitaka (Jing-shan Zang) in Ming Dynasty had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Buddhist literature and social history materials, and it also reflected the innermost value i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humanistic spirits.

Keywords: Ming Dynasty; Jing-shan Edition of the Buddhist Tripitaka (Jing-shan Zang); Jing-shan Temple

大藏经，是将历代汉译佛教经典按照一定的结构规范进行编排，并具有一定外在标志的汉文佛教典籍和相关文献的丛书。¹从东汉时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对于典籍的整理和编写工作就几乎在同时开展，仅有明一代，就曾有《初刻南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径山藏》等多个版本的大藏经，其中，又以民间力量为主导而刻印的《径山藏》因其活动历时之久、参与人数之多、过程之辗转复杂，而成为了明代佛教史上十分重要的历史事件，并为中国佛教经典文化的流传做出了巨大贡献。

《径山藏》因其刻藏和储藏经版的地点主要在浙江余杭径山而被称为《径山藏》；又因其将以往大藏经的“梵策本”装帧方式改为“方册本”而被称为《方册藏》；或因其最后主要在浙江嘉兴楞严寺进行印刷和流通而被称为《嘉兴藏》。以往学界对于《径山藏》已多有研究，然而纵观学者们围绕《径山藏》的研究成果，整体上呈现出碎片化，对于《径山藏》刻印的发展脉络叙述亦不甚清晰，²故而本文力图对明代《径山藏》刻印的背景、准备工

作、经过和结果进行系统性梳理，并探讨明代刻印《径山藏》的意义，以此推进对明代佛教史和社会史研究的深入。

一、刻印背景

（一）明代佛教世俗化程度加深，僧人重振宗门的愿望急需通过刻藏流传得到弘扬。

一方面，随着明代佛教的发展日益走入世俗，僧俗急剧混杂的趋势日渐深入，以往佛教中种种严格的清规戒律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已经逐渐失去了对于佛门子弟的约束能力，加之明中后期，一批新兴宗派，如罗教、无为教、净空教、悟明教等，都在以似佛似道的形式在民间大肆流播，影响颇为深远，这对于传统佛教来说无疑是一种非常巨大的挑战，重起正法也因此成为当务之急。

另一方面，佛教宗门内部在明中期较为严苛的佛教政策的压迫下，表现出沉寂萧瑟的一面。作为刻印《径山藏》的主要发起人，密藏道开曾面对残碑荒寺，心下怆然，遂发出“法道陵夷，莫此为甚，遂愿毕此生身命，募刻方册板，广作流通”³的宏愿。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的憨山德清也指出，当时中国的佛法已是“法门所系，九鼎一丝；外患内忧，犹楚入郢”⁴，处在生死存亡的边缘，而真可、道开等人极力推行的刻印事业，则是挽救了末世之下的中国佛教，其重要意义“不啻秦庭之哭，真有夺军拔帜之意。其恢复法界之图，远且大矣。”⁵。而这一时期，佛教经历了嘉靖时期的生存危机，开始在万历年间迎来第二次发展机遇期，国家对于佛教的禁锢政策日益瓦解，佛教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迎来了复兴的契机，方册本大藏经的刊刻历程也由此得以开启。

（二）明代之前的大藏经存在着多种问题，刻印方册大藏经是客观上的大势所趋。

在《径山藏》之前，明代刻印的大藏经版本虽多，但都存在或多或少的

问题：一方面，作为官方藏板的“北藏”，内容较为精确，且由于多藏于禁中而保存较为完好，但也因其常在禁中，“印造苟非奏请，不嗽擅便”⁶，不便于在社会上的广泛流通；另一方面，作为民间流通藏板的“南藏”，虽然印造较为简易，但因其印造者多，“已模糊不甚清白矣，且岁久腐朽”⁷，亦于佛法传播不利。因而我们认为，《径山藏》的刊刻，最为直接和主要的原因是将以往经藏的梵筴版本改为更加便于携带和翻阅的方册线装版本，以此增进大藏经的广泛传播和影响。同时，由于方册大藏经的印造更为简易，所需费用相较于梵筴本也更为低廉，因而更容易为大小寺院和普通百姓的日常使用提供便利，“念梵筴繁重，愿易为方册，可省简帙十之七，而印造装潢之费，不过四十余金，即穷乡下邑、山陬海隅之人，可以酬终年不见之叹。”⁸

此外，由官方刊刻的《永乐南藏》、《永乐北藏》中还存在着大量错误，重新刻印大藏经也为修订旧有版本的讹误提供了机会。万历十五年（1587），极力推进方册本大藏经刊刻的居士冯梦禛在面对首都颁赐的大藏经时，也叹息“大藏装潢甚丽，纸则甚旧印多矣……内缺‘泰’字而补‘秦’字，‘鸟’、‘焉’成‘马’”。⁹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密藏道开提出“凡大藏未收疏论，皆收梓于藏中，印施于海内，……请以三藏并校，参之英贤，正其讹谬”，¹⁰可见重新刻印大藏经在客观上也是非常必要的。

二、刻印准备

（一）发动舆论，统一思想。

最早提出刊刻方册本大藏经的是袁了凡居士，即袁黄。万历元年（1573）时，他曾在武塘塔院与幻予法本谈及此事，认为“释迦虽往，法藏犹存，特以梵筴重大，流传未广，诚得易以书板梓而行之，使处处流通，人人诵习，孰邪孰正，人自能辩之。”¹¹二人一拍即合，只是这个提议在当时由于诸多条件的不具备而并未得到实践。万历七年（1579），紫柏真可自嵩山少林寺返回，途经大云寺，法本于是与其围绕刻藏事宜进行了第一次交谈，真可当时即表示愿为“刻藏之旗鼓”。¹²万历十一年（1583），袁黄又出面与当时“寄

迹于汾湖之敝庐”¹³的真可商议此事，得到了真可的肯定和重视，并将任务托付弟子密藏道开。在真可后来撰写的《刻藏缘起》一文中，也高度肯定和赞扬了袁黄对方册大藏经刻印的首倡之功，认为“法本、道开、不才老汉及现前一切刻藏施主，皆袁汾湖之化身也。”¹⁴

其后，从万历十二年（1584）年开始，密藏道开开始四处奔走联络，广泛地发动有社会影响力且热衷于佛教的人士撰写劝募文，以此募集刻藏的启动资金，陆光祖、冯梦禛、于玉立、王世贞、傅光宅等人都先后撰写了文章，这些带有募化性质的文章有力地发动了舆论，极大地扩大了刻印方册版大藏经的社会影响。

然而这种刊刻方式的提出，在当时还是收到了不少反对的声音。如道开，在闻听刻藏之事之初就曾提出“易梵筴为方册，则不尊重”，其师真可则开导他说：“梵筴虽尊重，而不解其意，则尊之何益；使方册虽不尊重，以价轻易造，流之必溥。”道开闻听教诲，“泣涕俱下，跪而发誓……藏板不完，开心不死。”¹⁵由此坚定了刊刻方册本大藏经的信念。此外，相传还有一些保守派的官员将这件事向有司提出了弹劾，经过时任南京国子监祭酒冯梦禛的说明，才将事件平息下来，道开在写给冯梦禛的信中也提到“刻藏因缘，科臣有言，幸宗伯题覆无恙”¹⁶，似乎是确有此事。可见，对于方册本大藏经的刊刻，无论是佛门内外，都经历了统一思想的过程。

（二）广募资金，选择场地。

刻印方册大藏经所需的经费来源是真可、道开等人在倡议之初就思考的问题。据当时参与募刻的管志道评估，刻印全藏预计需要“期订十数禩，费募三万金”¹⁷，法本则认为需要更多资金来完成这项事业。而在最初动议之时，资金的募化就已经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万历十年（1582），法本就曾向真可提出：“众生以财为命，岂易乞哉？……以世外之人，乞人性命，谁愿之哉？”¹⁸面对这种困难的情况，真可表现出了格外的超脱与豁达，他安慰法本不要以募化资金为难事，要坚信“以财为重者，诚聪明未启耳，如聪明一启，即知此身幻化非坚，此心起灭不常矣。”¹⁹

最初表示愿意为真可刻印《径山藏》提供经济援助的是慈圣皇太后。她素来尊崇佛教，礼敬真可，当她闻听刻藏的消息，随即于万历十四年（1586）“欲发内帑命刻”²⁰，对此，真可并未接受，而是说“印经自有人”²¹。实际上，作为此项活动的发起人，他更希望通过广募的方式逐步积攒资金，“宜令率土沾恩”²²，以此作为传播佛法的有效途径。在万历十五年（1587），他又邀请十位善信集会燕京龙华道场，他们初步制定的筹款方案是“岁各捐贖为唱缘，又一人则各劝三人为助缘”²³，希望以这种方式完成刻藏大业。但三十个人组成的筹款集团力量也实在不大，后来又经过反复讨论，最终确定了“以四十人为缘首，每人岁助百金，与刻工相终始”的筹款方案，其中“燕、赵、齐、鲁大约有二十人，江南如金坛之于、丹阳之贺，吴江、松江诸处拟求十人，外十人则求之徽州、蒲州二处。”²⁴虽然在实际的募化过程中，南方的诸位善信大多一掷千金，对刻藏表示出极大的支持，而北方的缘首，除山西监察御史傅光宅外，罕有响应者，但刻印方册大藏经的启动资金问题，还是已经基本得到了解决。

对于《径山藏》刻印地点，也经历了长时间的选择，负责刻藏事宜的真可、道开师徒多方寻访、广泛抉择，最终选定五台山妙德庵作为刻印地点。关于为何选择五台山作为最初的刻藏地点，道开在给傅光宅的信中提及，自己曾于万历十四年（1586）初，“以清凉、双径、牢盛、灵岩四名山求闾于释迦如来、文殊遍吉两大士及诸护法善神，以决狐疑，乃三举三得清凉，今则有不得不遵如来敕命矣”²⁵，法本在其发愿文中也提及是由于“卜吉清凉”²⁶才选择五台山作为刻藏场所，然而这类卜问实际上只是一个带有宗教意义的形式，归根结底的原因主要还是由于刻印大藏经作为佛教界的一大盛事，势必会选择具有神圣意义的殊胜道场进行，而五台山作为文殊道场和当时的佛教三大名山之一，道开称此地“在清凉最幽深处，清凉为震旦大菩提场”²⁷，的确是一个绝佳的地点。此外，五台山的无边禅师曾表示愿将自己的道场舍予真可、道开用以刻藏，这在客观上也促进了真可师徒选择五台山作为刻藏地点。

（三）制定规则，进行试刻。

万历十四年（1586）初，密藏道开就制定了刻藏的具体规则，对于刻藏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版本和文献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说明，要求“一章一句一字一画及提头行款，但有差殊，无论彼此是非，一概标出北藏之上，并注草本”²⁸，而对于之前几部官方颁赐的大藏经之间可能存在的版本差别，道开也提出了分别的应对措施，篇幅所限，兹不赘述。总之，道开制定的规则为《径山藏》的刻印明确了具体的方针，解决了最为直接和现实的问题。

在募集资金的同时，一些积极推动刻藏的江南士人还开展了小规模试刻。有学者提出：陆光祖、冯梦祯等人在万历十二年（1584）和十三年（1585）在嘉兴东禅寺分别刊刻了《禅林僧宝传》和《大慧普觉禅师宗门文库》，这两者都是对后期正式刻印《径山藏》的初期尝试。²⁹然而事实上，以上两者虽被收入了《径山藏》，但在后世记载中并未提及它们是否作为后世刻印的模板典范，因而从这一角度来说，这样的试刻，其意义几乎是微乎其微的。

实际上，真正为《径山藏》的正式刻印提供范例的应当是万历十四年（1586）由吴惟明施资刻造的《弘明集》。在吴惟明撰写的发愿文中，就提到他曾在真可面前问梦，真可告诉他“今诸名卿开士，欲别梓藏典，广流通尔，其或有缘于此藏中”，又详细说明“《弘明集》实文字般若前茅，宜先就梓，启世聋聩”，吴惟明“遂从事如师命”。³⁰当年冬天，《弘明集》刻印完成。此后，《弘明集》不仅得到了佛教界的认可，并被认定为正式刻印《径山藏》的模板典范，这一点，从万历十九年（1591）左右密藏道开在给南方诸檀越的信中就可以看出。在信中，道开曾多次评价由傅光宅捐刻的《华严合论》“写刻颇精，不亚《弘明》诸书”³¹，可见他实际上是以《弘明集》作为刻印的典范的。而对于参加刻印大藏经的刻工，道开也是以其手法是否与《弘明集》的刻印手法相一致来作为衡量的，认为“此时写刻所尚，皆《弘明集》家法”，而对于那些达不到标准的工人，他则表示“山间此时选择颇精，不亚《弘明》，少有差池，难乎情庇。”³²由上可见，《弘明集》才应当被看做是

真正意义上对《径山藏》的试刻。

至此,《径山藏》刻印的前期准备工作基本完成,正式的刻藏已经蓄势待发。

三、刻印历程

《径山藏》在明代的刻印经历了山西五台山、浙江余杭和浙江嘉兴三个阶段,学界以往对首、末二阶段已经有较多且全面的研究,故在此仅进行简要梳理,而着重对其在浙江余杭径山阶段进行说明。

(一) 五台山阶段

《径山藏》的正式刻印始于山西五台山妙德庵,持续时间主要是从万历十七年(1589)到万历二十一年(1593)。这一时期的刻经活动规模十分弘大,“南北云集僧伽百余”³³,加之资金充足,参与刻藏者和发金助缘者都有着很高的热情,“或团圞坐冰雪堆中,安般希微,兀若枯木;或勇健向昏散场内,身心踊跃,气夺三军”。³⁴在五台山妙德庵期间开展的刻经,版式规范,刻工精美,被学者认为“是《嘉兴藏》全部刻藏史上组织最为严密的时期”。³⁵

这一时期,负责刻藏工作的主要还是密藏道开,他一面侍奉其师真可,一面往来于五台山与江南诸地之间,在《径山藏》收录的《密藏开禅师遗稿》中,就收录了大量他与诸居士檀越的来往书信,信中也涉及了有关刻藏的种种事务,包括经藏内容、刻印版式、刻藏人员花销、檀越施舍随喜等等。

(二) 径山阶段

万历二十一年(1593),刻藏工作开始南迁至浙江余杭径山。关于南迁的原因,主要有三:其一是由于五台山地处北方内陆地区,冬季漫长而寒冷,不利于储藏经板,“移于杭之径山,山在江南,极于温暖。”³⁶其二则是

由于五台山地势险峻，交通不便，刻经所需材料等大多需要由南方转运至此，“其岭道回复，转输倍费工力，议而之径山”³⁷；其三则是由于在这一时期，从中国佛教整体发展水平来看，南方领先于北方，而刻经事业所仰仗的倡导者、主持者、出资者以及众多的刻经工匠大多来自南方，出于对人的需求和对刻藏经费的考虑，这是刻经事业南迁的又一客观理由。

对于《大藏经》具体于何时开始正式在径山刻印，《径山志》中并无明确记载，但依据明人陈瓚《赠幻予、密藏二上人唱缘刻〈大藏〉序》和于玉立《赠幻予、密藏二师唱缘刻〈大藏〉叙》两文以及在《密藏开禅师遗稿》中收录的《附刻径山请书》可明确得知，在地方士绅和径山寺僧众圆昭等人的竭力邀请下，密藏道开和幻予法本二师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始住径山，由此成为了径山寺承接五台山刻经任务，开始刻印大藏经的正式开端。而事实上，南迁的准备工作早在五台山刻藏工作启动不久后，就已经开始了，主要负责这项工作的是江南居士冯梦禎和缪希雍，道开曾于写给二人的信中提到：“双径之图，似不可缓，足下与仲淳其密留意焉，务使彼辈欢欣乐成，事乃可久，且于化风无损也”³⁸、“双径之图，于今似未可缓，兹幻居兄南还，当送其挂锡彼所，潜为启发，然后足下与开之先生因之往反，以便宜取事，俾彼辈无所猜忌，倾心乐成，斯为得也”。³⁹从万历二十一年（1593）开始一直到明末，方册本大藏经的刻印几乎主要在径山完成，而根据刻经地点的变化，又可以按照径山兴圣万寿禅寺——径山寂照庵——径山化城寺这样的路径，对这一时期的刊刻活动进行仔细区分。

1、径山兴圣万寿禅寺时期

从五台山妙德庵南迁之后的刻经工作最初是在径山兴圣万寿禅寺展开的，但是这一时期，由于搬迁工作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因而《径山藏》的刻印也尚处于从北方向南方的过渡阶段，故而实际上在径山兴圣万寿禅寺时期刻印的大藏经数量并不多。

2、寂照庵时期

寂照庵在径山兴圣万寿禅寺之“寺北五峰之背”，初为“寂照房”⁴⁰，是径山寺的别院之一。万历二十二年（1594）时，“陆五台、冯开之诸公因捐

货置，以供紫柏大师，遂为密藏、幻予二师刻藏道场。”⁴¹关于刻印工作为何由径山兴圣万寿禅寺转到了寂照庵，史料中并无明确记载，有学者提出可能与万历二十五年（1597）密藏道开的神秘失踪和其弟子念云兴勤外出寻找有关⁴²，然而笔者认为这样的解释仍然不能回答念云兴勤在寻访未果返回径山寺后何以另立门户，在寂照庵重新开始方册大藏经的刻印，目前也只有寄望于更多资料的发现和研究，方能对这一问题进行更为合理的解释。

然而可以明确的一点是，随着密藏道开和幻予法本的相继离开，《径山藏》的刊刻确实经历了一段相对沉寂和停顿的时间，“自万历二十八年以前，事经数载，人历存亡，交单固存，势难清理。”⁴³直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念云兴勤开始接管寂照庵，这才使停滞一时的刻经工作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直到万历三十八年（1610），大量的佛教典籍在寂照庵得到刻印，这一时期也因此成为方册大藏经在径山刻印阶段的一个高潮。

万历三十八年（1610），澹居法铠随紫柏真可灵龕来到径山寂照庵，接替了念云兴勤之前的工作，不久，他便在真可的俗家弟子吴用先的帮助下修复了径山寺下院——化城寺，逐渐将刻藏工作的中心由寂照庵转到了那里。

3、化城寺时期

化城寺旧时为“宋宣禅师道场”⁴⁴，洪武时曾奉敕重建，为“本朝钦赐之名蓝也”⁴⁵。其实早在方册大藏经南迁之初，居士冯梦禎就曾提议选择化城寺作为刻藏的场所，据其日记所载，在万历二十三年（1595），冯梦禎曾到径山寻访刻造和储藏经板的场所，“见云雾中山翠隐隐，即径山也。二里许，为化城寺旧址，议欲倡缘建精舍，为刻经、藏经之所”，而当时之所以没有定夺，则是由于他认为此举“非千金不能举事”⁴⁶。而到了万历三十八年（1610）左右，冯梦禎之所以再次提出将刻经地点从寂照庵改到化城寺，则是由于事至此时，刻经工作已经过半，重点也从之前以刊刻为主向贮藏经板转移，而寂照庵地处山中，“云雾笼罩，十日而九，藏板其中，最易朽腐。”⁴⁷而化城寺位于径山东麓，地势低平，少有云雾，不仅方便贮藏经板，同时“输工之力，事事皆宜”⁴⁸。憨山德清在后来的也曾提及将刻藏之地“宋迁化城，可谓得所，其建议始于冯太史。”⁴⁹

但此时，化城寺已经荒废多年，且为当地豪强所占，故而从冯梦禎提议，到随后“先为屋十间，令足以安经板、处工匠，而化役徐俟其后”，⁵⁰再到居士吴用先“按址画界，夺诸豪右之手，仍为佛地，又赎临安太平寺田百亩，供贍常住”⁵¹，实际上又经历了三年左右的时间。经过二人的努力，到万历四十一年（1613）时，化城寺已经得到了较为完善的修复，刻经工作也完全转移到了这里，澹居法铠随之来到化城寺，并在此住持达十年之久，直到天启元年（1621）去世，刻藏工作也随之再一次陷入相对沉寂。

（三）楞严寺阶段

楞严寺，在嘉兴西北二里，始建于宋嘉佑八年（1063），曾为华严宗名僧长水法师疏经之所。元末时毁于战火，明洪武初重建，嘉靖时又废。到了万历中，真可、道开等人联合陆五台、陆云台兄弟二人提议兴复该寺，神宗母亲李太后予以大力协助，不仅“敕建禅堂及天王殿”，还“遣内臣赍赐藏经五千卷及护藏紫衣观音”⁵²，楞严寺由此得到恢复。

在刻藏工作南迁之初，嘉兴楞严寺就被确立为《径山藏》的印刷流通中心，明确规定“山之寂照主收藏，禾之楞严主流行”⁵³，与径山寂照庵并列作为刻印大藏的两大中心。到了天启之后，经过近三十年的刻印，随着大部分经板的雕凿工作已经完成，负责收藏经板的径山寺的中心地位已经逐渐趋于弱化，而负责经藏流通的楞严寺逐渐一家独大，成为了更为主要的活动中心，《径山藏》的刻印也由此进入楞严寺阶段。

同时，随着国家开始逐渐陷入动荡，以往大规模的刻藏已经不能继续开展，方册大藏经的刻印方式在此时也不得不发生改变，即由此前在一地刊刻和印刷，改为“四方有道力者，随讨未刻名目同式就梓”，⁵⁴在这样的条件下，楞严寺的中心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天启二年（1622），白法性琮在楞严寺“主禅堂事……流通大藏，永成规画”⁵⁵，其后二十余年，白法性琮一直在此为刻藏事业奔走，钱谦益在其文《嘉兴营泉寺白法长老塔表》中也说他“重修山门廊庑，定经坊规划，藏紫柏藏公宿缘，续佛慧命，不惜脑髓。”⁵⁶

但是，随着国家开始逐渐陷入动荡，以往大规模的刻藏已经不能继续开展，方册大藏经的刻印方式在此时也不得不发生改变，即由此前在一地刊刻和印刷，改为“四方有道力者，随讨未刻名目同式就梓”，⁵⁷而随着社会动荡的加剧，“已刻者不及归山，未刻者懈不速完”，⁵⁸方册本大藏经的刻印变得越发艰难。直到弘光元年（1645），贵州僧人利根向南明朝廷上书，再次号召继续《径山藏》的刊刻，并提出了如刻板未完、搜录不全等八项亟待解决的问题，希望重振刻藏事业。⁵⁹然而战时频仍，刚刚成立的弘光朝廷不久后走向了覆灭，利根所极力主张的刻藏事业也随之再度搁浅。至此，《径山藏》在明代的刊刻宣告结束。

四、明代刻印《径山藏》的意义

首先，明代刻印的《径山藏》具有很高的佛教文献价值。《径山藏》（《方册藏》、《嘉兴藏》）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方册版大藏经，它收录了大量宋代以后的佛教书籍，清代思想家龚自珍曾经做诗赞曰：“径山一疏吼寰中，野烧苍凉吊达公。何处复求龙象力，金光明照浙西东。”⁶⁰同时，它也被誉为是中国近代佛教史研究领域的“敦煌发现”和“佛典史料宝库”，⁶¹特别是明末一些高僧弟子将其师的著作刻印后“附藏流通”，也有力地保存了大量明清两代佛教僧人的著述，这对于明清佛教史的研究无疑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资料来源。

其次，明代刻印的《径山藏》中保留了大量反映明代社会生活内容的资料，故而具有社会史料价值。在方册大藏经刊刻的过程中，还留下了大量反映社会生活内容的资料。如嘉兴楞严寺在流通大藏时制订的《经值画一》，其中记录了印刷经书的本数和价格，又由于随着刻印工作的开展，加入了新的书版，同时也对旧有经板进行修复，《经值画一》也随之进行了多次修改，可能的次数达到四次之多。⁶²这些内容对于研究明清时期嘉兴地区的社会经济情况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同时，在每册大藏经的书末都刻有牌记，这些牌记中记载了大量刻书信息，如参与刻经者的身份、出资的数量、所刻的经

名、募化的寺院、刻写工匠的姓名、刻写时间、藏版寺院等，这些牌记不仅反映了当时江南地区僧人和信众对于佛教活动的热衷，同时也对江南地区出版业发展和社会风貌进行了展现。

第三，明代刻印的《径山藏》是明代地区文化交流的有力代表。一方面，从方册本大藏经的刊刻之初，就有大量江南地区的佛教僧人和热衷佛教的人士为之往来奔走，他们不仅用实际行动推动了《径山藏》的顺利刊刻，同时也将江南地区的文化带到了其他地区，而随着其他地区请刻藏经活动的开展，也将不同的文化内容引入江南，实现了地域文化在全国范围内的流通。另一方面，凭借着有利的地理位置，《径山藏》也随着大量来华学习佛法的日本僧人流传到了日本，径山寺甚至因此被日本禅宗尊为“祖庭”，从这个角度来看，《径山藏》不仅促进了中日间的文化交流，明代中国的佛教也正是通过这样的路径在日本得以继续传播，并对其后带有明显日本传统特色的佛教文化和日常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四，明代刻印的《径山藏》还反映了创新、坚持和包容的人文精神。回顾方册本大藏经的刊刻历程，从最初动议时即提出改变传统经卷的装订方式，使用方册本以便流通，这充分体现出了《径山藏》的发起者以重振宗门之风为出发点，锐意进行大胆创新的精神。同时，明代方册大藏经的刊刻，从万历十二年（1584）年密藏道开进行宣传开始，到顺治二年（1645）白法性琮以身殉寺保全经藏，历时半个世纪，这期间又经历了刻经场所的搬迁、主持人员的变动以及明清易代战火的洗礼，而几代僧人前赴后继，在清康熙时期才最终大业得成，这其中无不反映出众多参与者坚持不懈的拳拳之心。此外，《径山藏》在内容上不仅收集和整理了明代以前大藏的基本内容，还广泛收录了明末佛教僧人和热衷佛教人士的种种著述“随藏流通”，这些藏外典籍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佛教文化的内涵，更加体现出了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

注释:

- 1 方广钊:《谈〈嘉兴藏〉的历史地位》,载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7期,第76-80页。
- 2 以往学界围绕《径山藏》多有讨论,限于篇幅,仅列举近年来相关研究成果:毛文骛:《毛晋与僧侣之交游及刻经考》(载于《宗教学研究》,2011年04期,第250-255页)、《汲古阁刻经考略》(载于《图书馆杂志》,2010年01期,第69-71+75页);王彦明:《钱谦益与〈嘉兴藏〉考论》(载于《新世纪图书馆》,2013年01期,第61-64页);业露华:《密藏道开与〈嘉兴藏〉》(载于《五台山研究》,1991年02期,第35-37页);金申:《〈嘉兴藏〉的主刻僧密藏事辑》,收入《佛教美术丛考》(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嘉兴藏〉的正式刻经前的刻经》,收入《周绍良先生欣开九秩庆寿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7)。此外还有:杨玉良:《故宫博物院藏〈嘉兴藏〉初探》,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1997年第3期,第13-24页;李学勤:《〈嘉兴藏〉与明清之际历史研究》,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03年第1期,第5-6页;章宏伟:《故宫博物院藏〈嘉兴藏〉的价值——从〈嘉兴藏〉学术研究史角度来探讨》,收入《故宫问学》(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方册藏的刊刻与明代官版大藏经》,收入《明清论丛》第五辑(北京:故宫出版社,2004)。
- 3 (明)释道盛:《密藏开禅师遗编序》,见(明)释契颖:《密藏道开禅师遗稿》卷上,《嘉兴藏》第23册,第B118号,第1页。
- 4, 5 (明)释德清:《刻方册藏经序》,见《憨山老人梦游集》卷19,《卍新纂续藏经》第73册,第1456号,第595页。
- 6, 7, 12, 14, 15, 18, 19 (明)释真可:《刻藏缘起》,见《紫柏尊者全集》卷13,《卍新纂续藏经》第73册,第1452号,第252页。
- 8 (明)冯梦禎:《刻大藏缘起》,见(明)宋奎光:《径山志》卷五《序文》,杜洁祥编:《中国佛寺史志汇刊》第1辑第31册,台北:明文书局,1980年,第436页。
- 9 (明)冯梦禎:《快雪堂日记》卷1,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第4页。
- 10 (明)释道开:《募刻大藏文》,见《密藏开禅师遗稿》卷上,第7页。
- 11, 13 (明)袁黄:《刻藏发愿文》,见《密藏开禅师遗稿》卷上,第5页。
- 16 (明)释道开:《与真实居士》,见《密藏开禅师遗稿》卷上,第18页。
- 17 (明)管志道:《刻大藏植因疏》,见《径山志》卷5《序文》,第484页。此外,关于《径山藏》刊刻所涉及的经济问题,还可以参阅:Lianbin Da:《The Economics of the Jiaxing Edition of the Buddhist Tripitaka》一文,载于《T'oung Pao》, Second Series, Vol. 94, Fasc. 4/5 (2008), pp. 306-359。
- 20, 22 (明)于元凯:《密藏禅师遗稿序》,见《密藏道开禅师遗稿》卷上,第1页。
- 21 (明)陆符:《紫柏尊者别集附录》,见《紫柏尊者别集》附录卷4,《卍新纂续藏经》,第73册,第1453号,第429页。
- 23 (明)释道开:《刻大藏愿文》,见《密藏开禅师遗稿》卷上,第22页。

- 24（明）释道开：《与徐文卿居士》，见《密藏开禅师遗稿》卷上，第17页。
- 25（明）释道开：《与傅侍御》，见《密藏开禅师遗稿》卷上，第17页。
- 26（明）释契颖：《幻予大师发愿文》，见《密藏开禅师遗稿》卷上，第5页。
- 27, 33, 34（明）释道开：《与朱济川、乐子晋二居士》，见《密藏开禅师遗稿》卷上，第3页。
- 28（明）释道开：《密藏禅师定制校讹书法》，见《密藏开禅师遗稿》卷上，第7页。
- 29 王火红、朱莉韵：《〈嘉兴藏〉的刊刻、出版与当代价值研究——兼谈〈嘉兴藏〉与嘉兴的渊源》，载于《嘉兴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第19-24页。
- 30（明）吴惟明：《刻大藏愿文》，见《密藏开禅师遗稿》卷上，第5页。
- 31（明）释道开：《又与冯开之居士》、《与松江康孟修居士》、《与瞿元立居士》，见《密藏开禅师遗稿》卷上，第15-16页。
- 32（明）释道开：《与吴康虞居士》，见《密藏开禅师遗稿》卷上，第15页。
- 35, 42 李富华、何梅：《关于〈嘉兴藏〉的研究》，见《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第10章，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477页。
- 36, 57, 58（清）释观衡：《刻方册藏经目录序》，见《紫竹林颺愚衡和尚语录》卷7，《嘉兴藏》第28册，第B219号，第694页。
- 37（明）王在晋：《重复双溪化城接待寺碑记》，见《径山志》卷7《碑记》，第665页。
- 38（明）释道开：《与冯开之居士》，见《密藏开禅师遗稿》卷上，第15页。
- 39（明）释道开：《与缪仲淳居士》，见《密藏开禅师遗稿》卷上，第17页。
- 40, 41（明）宋奎光：《径山志》卷15《殿宇》，第1014页。
- 43（明）缪希雍：《念云勤上人接管寂照刻场缘起实纪》，见《密藏开禅师遗稿》卷下，第38页。
- 44（明）宋奎光：《题化城慈门师〈募斋僧缘疏〉》，见《径山志》卷4《序文》，第417页。
- 45（明）王在晋：《越镌》卷9《游径山记》，明万历三十九年刻本。
- 46（明）冯梦禎：《快雪堂日记》卷2，第30页。
- 47, 48, 50（明）冯梦禎：《议复化城缘引》，见《径山志》卷4《序文》，第408页。
- 49（明）释德清：《题化城募缘疏》，见《憨山老人梦游记》卷30，《嘉兴藏》第73册，第1456号，第686页。
- 51（明）释德清：《径山化城寺澹居铠公塔铭》，见《憨山老人梦游记》卷29，第665页。
- 62（清）嵇曾筠等：《浙江通志》卷228《寺观三》，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53（明）沈珣：《明吴江接待寺监寺前径山寂照庵司藏念云勤公塔铭》，见《密藏开禅师遗稿》卷2，第38页。
- 54（清）释观衡：《紫竹林颺愚衡和尚语录》卷7《刻方册藏经目录序》，《嘉兴藏》第28册，第B219号，第694页。
- 55（明）释智旭：《白法老尊宿八袂寿序》，见《灵峰满益大师宗论》卷8，《嘉兴藏》第36册，第B348号，第394页。

- 56 (清) 钱谦益:《嘉兴营泉寺白法长老塔表》, 见《牧斋有学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年版, 第1262页。
- 59 利根提出的八项问题分别是:“四方之板, 未归径山, 一也; 板未完, 未制方册藏首序, 二也; 贮板之方, 构造未广, 三也; 因板未完, 板头钱未总则定数, 四也; 板头钱预修贮板之室, 未得良策, 多有冒用, 五也; 录依五时之次, 其正译、重译、华梵传述, 未尽其详, 六也; 搜括古今名集, 遗漏未全, 七也; 因板未完, 劝者、施者、鳩工者, 未勒名于石, 以昭千古, 八也。”
- 60 (清) 龚自珍:《己亥杂诗第一四五》, 见刘逸生注:《龚自珍己亥杂诗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年, 第204页。
- 61 蓝吉富:《〈嘉兴藏〉研究》, 见《中国佛教泛论》, 台湾: 新文丰出版社, 2004年, 第163-174页。
- 62 王蕾, 韩锡铎:《关于〈嘉兴藏〉的几个问题》, 载于《图书馆学刊》, 2011年第5期, 第120-122+126页。

参考文献:

1. (明) 冯梦祯. 快雪堂日记 [M].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0.
2. 方广钊. 谈《嘉兴藏》的历史地位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2016, 37 (07): 76-80.
3. (清) 龚自珍. 龚自珍己亥杂诗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4. 蓝吉富. 中国佛教泛论 [M]. 台湾: 新文丰出版社, 2004.
5. (明) 释契颖. 密藏道开禅师遗稿 [M]. 《嘉兴藏》第23册, 第B118号.
6. (明) 释观衡. 紫竹林颯愚衡和尚语录 [M]. 《嘉兴藏》第28册, 第B219号.
7. (明) 释智旭. 灵峰满益大师宗论 [M]. 《嘉兴藏》第36册, 第B348号.
8. (明) 释真可. 紫柏尊者全集 [M]. 《卍新纂续藏经》第73册, 第1452号.
9. (明) 释真可. 紫柏尊者别集 [M]. 《卍新纂续藏经》第73册, 第1453号.
10. (明) 释德清. 憨山老人梦游集 [M]. 《卍新纂续藏经》第73册, 第1456号.
11. (明) 宋奎光. 径山志 [M]. 台北: 明文书局, 1980.
12. 王蕾, 韩锡铎. 关于《嘉兴藏》的几个问题 [J]. 图书馆学刊, 2011, 33 (05): 120-122+126.
13. 王火红, 朱莉韵. 《嘉兴藏》的刊刻、出版与当代价值研究——兼谈《嘉兴藏》与嘉兴的渊源 [J]. 嘉兴学院学报, 2015, 27 (06): 19-24.